

生之學說，或有時而可商。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」

遠在寅恪先生方壯年之時，已如是深切哀神州文化之喪，這種文化，亦為先生所肩，哀王，哀文化，哀自身，融為一體。1927年6月14日晚間，即王靜安先生自沉十二天之後，寅恪先生一生摯友與同道吳雨僧宓先生，與寅恪先生久談後，在《雨僧日記》中有如下記載：「寅恪謂凡一國文化喪亡之時，高明之士，自視為此文化之寄托者，輒痛苦非常，每先以此身殉文化，如王靜安先生是其顯著之例。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範圍，惟有大小輕重之別耳。」後來儘管寅恪、雨僧二先生未曾以身殉，而所做所為實帶有殉道精神。「文革」慘遇，二先生所同，其實也是一種身殉。寅恪、雨僧二先生終其一生，所維護者，正是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。維護之而不可得，所以表現為「往往憔悴憂傷」。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之聯語，不過一例耳。

寅恪先生所標舉的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本應人人得而具之，事實上，恰恰又只具於少數人甚至極少數人之身。比年以來，談中國文化之作累累，於中國文化發展之試作方案者多矣，新儒家乎，融合中西乎，批判傳統乎，皆各有所見。無論中國文化如何發展變化，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，終應是如柱之立。歲序輪移，世紀轉換，敢借此二語為祝為願。

唐振常

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

上海史誌學會會長

知識競賽的新世紀

胡為雷

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的門檻，回顧二十世紀和展望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時，不能不在總結往事的基礎上粗略地預測一下未來。我認為新的世紀將是充滿挑戰、希望和機遇的時代，也必然是非常嚴酷的競爭和淘汰的時代。簡言之，二十一世紀必將是文明飛躍進步和各國知識分子全力賽跑的新世紀。

所謂「文明進步」或「文化進步」包括兩層含義：一是指科學和技術的迅猛發

展，二是指文化大環境的不斷改善。千百年來，國與國之間相比，孰強孰弱，主要看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，所以「國強民富」曾經是中國世代人的夢想。中國歷來有句口頭禪：「弱國無外交」。意謂民貧國弱的國家，即使幅員遼闊，也難以取得大國的資格，在外交上很少有發言權。而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，又都離不開科學和



技術的進步，在古代是這樣，在「第三次浪潮」的現代更是如此。傳統的看法是，國家的大小主要取決於疆域的大小；但在今天，情況已經有所變化，疆域並不很大的國家卻可以成為經濟大國，日本就是這樣。由此可以預料，在二十一世紀，隨着物質文明突飛猛進，遲早會出現科技大國或文明大國，即使領土較小的國家只要在科技上擁有傑出成就，也可以取得大國的資格和地位。從這個意義上，也許可以說，人類即將進入以科學技術稱霸的時代。

所謂「文化大環境」是何所指呢？即科學技術進步所需要的「經濟文化」條件、「政治文化」氛圍和「社會文化」氣候。缺乏這些方面的有力配合，科技的前進就會陷於舉步維艱的不利境地。不能設想一個生產落後、政治專制和社會混亂的國家能夠成為科技大國。

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，其進步和提高都離不開各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和勞作。在這個新時代，哪一國的知識分子在超導、基因工程、人工智能、社會學、社會心理學、文化人類學、行為科學……等領域能取得突破性成就，哪一國的綜合國力就必然強大，在國際舞台上就擁有較多的發言權，在對外戰爭中就可能成為勝利者；哪一國的知識分子在上述領域落後了，哪一國的綜合國力就必然比較弱小，在國際上就會處於沒有多少發言權的弱國地位，有時甚至在對外戰爭中吃敗仗。因此，說到底，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各國知識分子賽跑的時代，哪一國的知識分子跑在前列，哪一國就能贏得「金牌」或「銀牌」；哪一國的知識分子跑輸了，哪一國就沒有取得「名次」的資格，無情地被淘汰下來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，我才說未來的世紀也是一個嚴酷的「淘汰的時代」。

知識分子的成長、壯大需要一定的社會機制和政治、文化環境，有遠見的各國政治家應當從現在起就建立和完善這種機制和環境。不重視這個根本問題，僅僅依靠號召重視人才，僅靠有數的幾次重獎和表彰，是不能長期奏效的。不及早重視和解決關鍵問題，到二十一世紀來臨時，是會後悔莫及的。

處在世紀之交的重要時刻，中國的前途主要取決於科技、文化和知識分子的發展。五千年文化古國面臨着新的挑戰和問題，作為炎黃子孫，我們必須以嚴肅與認真的態度對待：否則，在二十一世紀是難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。

胡如雷

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